

浙東文化

EASTERN ZHEJIANG CULTURE

1998 2

石道啟青蓮禪宮不記年暗泉
傳半偈落日近諸天松響山偏靜
蘊深花更然楊枝如可拂吾欲訊
空詮
秋日席跑泉上作 竟文



PDG

宁波市文物考古博物馆学会会刊

一九九八年第二期（总第十期）

封面题签：启 功
封面设计：褚晓波
封底篆刻：高式熊



浙東文化

1998年第2期(总第十期) 1998年12月出版

宁波市文物考古博物馆学会会刊(半年刊) 订购 宁波市文化局文物处
宁波市文物考古博物馆学会秘书处
《浙东文化》编辑部编辑、出版
(宁波市解放北路91号 邮编:315010)
主编 董贻安 印刷 浙江省鄞县文教印刷一厂

浙内图准字(98)第191号

目 录

编者的话.....	(1)
《周节之印存》序.....	马承源(2)

浙东古水利研究

它山堰研究.....	周时奋(3)
------------	--------

“邓小平理论与文物工作研讨会”论文选辑

发展才是硬道理——改革开放 20 年来宁波文物事业发展述论	宁波市文化局(31)
观念 法制 个性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三题议	董贻安(40)
浅谈新时期文物保护工作理论与实践需要认识和把握的几个问题	马 兰(47)
利用文物资源 发展文化产业	许金和(57)
改革开放与宁波城市考古	林士民(66)
试谈文物商店的形象设计	翁平娜(73)
加强和完善文物法制建设是保护文物最有利的武器	
——试论文物保护工作中的法制建设问题	李宝才(79)
市场经济条件下推进文化产业化的实践与思考	虞浩旭(87)
新时期博物馆工作断想	施祖青(92)
大众传媒与建立新时期文物保护新体制	曹砚农(97)

越窑青瓷研究

《浙东青瓷与越窑》序.....	周时奋(103)
论早期越窑青瓷及装饰艺术.....	李 军(107)

张苍水研究

张苍水“一线归何处”.....	周冠明(126)
-----------------	----------

古籍与文献

- 天一阁新藏书目录……………骆兆平(133)
抹云楼聚书惠桑梓……………骆兆平(137)

甬式传统家具研究

- 《甬式家具》序……………周时奋(142)
甬式传统家具十二大特色……………吴 慈(145)

考古学研究

- 论海洋文化中代表性器物——石镑……………林士民(150)
老虎山揭秘……………邵九华(170)
日本弥生人的丝织、衣服、玉饰、纹身与我国古越文化的关系 ……应长裕(174)
走近水下考古——兼谈浙江沿海水下考古前景及设想……………傅亦民(187)
河姆渡遗址出土五叶纹饰之探讨……………姚晓强(195)

考古新发现

- 浙江宁波宋代孔庙遗址发掘简报……………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201)
宁波市发现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基石……………褚晓波(213)

文物与文物保护

- 试论明州碑林的形成、内容及文化价值 ……虞浩旭(219) ✓
出土钱币的分离与除锈……………王 玮(227)

学术动态

- 毛昭晰教授在天一阁讲学……………(39)
全国文物系统“邓小平理论与文物工作研讨会”在甬召开……………(65)

文博简讯

宁波市第三批历史文化遗址碑竖立(72) 宁海发现越窑窑址(78) 天一阁技防工程通过验收(106) “甬上十佳名桥”评选(119) 宁波服装博物馆开馆(132) 天一阁南园落成开放(136) 慈溪博物馆建成开馆(141) 宁波市文博系统首届“四个一”精品工程评选揭晓(149) 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宁波工作站正式挂牌(186) 宁波市文物部门积极开展月湖历史文化景区调查工作(216)

责任编辑、校对 徐建成

编者的话

记得5年前,一种使命和责任的驱动,《浙东文化》(半年刊)在同仁的期盼与关切中面世了。5年后的今天,当第10期《浙东文化》刚从印刷厂送到编者手中的时候,一种颇具偶然所得的喜悦,又伴随着几分踌躇,几分缺憾挤入心绪,不禁感慨几多。

按照常规,作为一个城市的文物考古博物馆学会会刊,《浙东文化》自然要以研究刊载文物学、考古学和博物馆学等文物系统所系学科为宗,然而,面对当今社会科学的发展趋势,又就浙东文化这一在中土堪称源远流长、丰盈深邃、生机盎然的区域文化而论,怎能退避三舍,甘于寂寞而无所用心?正因为如此,在过去的5年里,我们深知学识浅薄,力不能逮,但还是如履薄冰般地且比较认真地做了一些事情,其一,力求在文博学科与浙东文化乃至泛学科、跨学科之间构筑新框架方面勇于实践;其二,突出地域优势,体现个性特色,使刊物学术性、可读性与资料性尽量兼而有之;其三,努力对刊物的版式、装帧、封面设计等进行追求,以提升其整体品位。

过去的毕竟已经过去,面对的又将是一个更加复杂,又更加璀璨的天地,既然复杂,就需要敢于不懈地探索,世界璀璨,更应该乐于无偿地付出。但愿《浙东文化》能在继续的探索中去获取新的认知,在不尽的奉献中去创造新的价值。

《周节之印存》序

● 马承源

周节之先生篆刻集出版,这是中国篆刻艺术可贺的事。

明清流派篆刻发生、发展至今六百余年,出现了许多卓越的印人,他们的作品长留于印史。晚近百年以来,各家又有以金文、石鼓、泥封等文字入印者,于是开创了格调各异的新流派。一些超越传统印学而另辟蹊径的印家,以夸张、诡奇为创新;或以碎击印面、边缘而替代镌刻者,一时成为风气。篆刻是书法、章法和刀法特定的结合体,如诸未能和谐,则势难立于篆刻艺术之林。方寸之地,颇费经营。

节之先生为予少小时师友,一九四四、四五年间,予居于甬江,常过从先生之翰墨林印社,遂初知篆刻章法及执刀若使笔的原理,乃得启蒙。予其后尤喜金文而以之为专业,和节之先生相处的经历颇有渊源。回忆往事,常感情趣依然。

节之作印,有非常深厚的秦汉篆刻根蒂,这在当今是很为难得的,其作品融入西泠诸家之长,而并不囿于一家的风格,融和锻炼,于端庄淳朴的形貌中呈现出清丽蕴藉的印风。运刀道劲,篆势架构稳重,不以奇巧取胜,几十年来,坚持在传统法度中发展其艺术创作,从不媚俗,卓然成为名家。先生寿龄已七十有八,近观其新作,比往年更添风采。今精选其作,汇为印集,差不多一个甲子的专业精神,凝聚于此,实为印学史上值得称扬的贡献,是为序。

(作者系我国著名青铜器学家、上海博物馆馆长)

它山堰研究

□ 周时奋 □

它山堰在浙江宁波的西部山麓，位于鄞县的鄞江镇。这里是甬江支流奉化江的第一个分支鄞江与它的上游樟溪的分界线，工程始建于唐文宗大和七年（833），经历代维修增益，至今仍发挥着它的水利作用。1988年1月，经中国水利史学科带头人姚汉源教授等专家的建议，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至此，在第三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属于古水利工程的仅有灵渠、郑国渠、都江堰和它山堰等4个。它山堰为“中国四大古水利工程之一”的说法即出于此。

本文的目的在于以作者的实地考察和研究心得，迄今为止对于它山堰的主要研究成果，对这座古水利工程的研究作一个阶段性的总述，并对它山堰的文献评述、建筑动因、它山释名、强堰、魏巍生平提出新的看法。

一、历代文献中的它山堰

迄今可稽最早记载它山堰的文献间接来源是成书于宋淳祐（1241—1252）间魏巍的《四明它山水利备览》（以下简称《备览》）。关于这本书的研究，笔者在下面还将专门论述。现在所要提出来

的是,在这部著作的“卷下”中,收录了唐代僧人元亮的一首《它山歌诗》,其中说:“它山堰,堰在四明之鄞县,……太和中王侯令,清优为官立民政。……略呼父老问来由,便识机谋造其堰。垒石横铺两山嘴,截断咸潮积溪水。灌溉民田万顷余,……时人若解感此恩,年年祭拜王元晔。”[1]这首用七言古体写成的诗歌,为我们概括地提供了一些基本的信息。一是该堰建于“太和”中,即在唐文宗大和年间(827-835),作为本朝的人,且是僧人,一般来说不太可能打诳语。二是主持这一工程的是“令”“王元晔”。三是工程的内容是“垒石横铺”于“两山嘴”之间。四明工程的作用是“截咸积淡(溪水)”。

但是宋淳祐距唐大和毕竟有400余年之隔,是否有可能是魏觐的前人讹传?这首诗里又提供了另一个信息,僧人元亮因感于当时堰旁没有祭祀王元晔的庙,却立了一座其他神庙,他因此很有些不平,说:“山边却立他神庙,不为长官兴一祠。本是长官治此水,却将饮食祭闲鬼。”它山庙建于何时?现可考的文献,只有《备览·卷上·请加封善政侯申府列衔状》有这样的叙述:“缘神于唐朝已封善政侯,本朝乾道四年邦人有请,准省札,仍封善政侯,赐遗德庙额。”并且魏觐在《备览》中专门为此歌诗作了跋,内说到“予方幼时,盖尝耳其歌之大略矣,每以石刻不存为恨。咨询耆老有年,于兹近划得墨刻读之,甚喜”。因此这首歌诗基本可确定写于堰成之后而建庙之前,下文还会讲到。

最早记载它山堰的直接文献,今可稽考的是成书于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知州张津所纂的《四明图经·卷二·鄞县·渠堰二》,其首条说:“它山堰,在县西南五十里。唐开元间邑宰王元晔之所建也。累石为堤,江河分流截为二,若神工然。明之为州,濒海枕江,水善泄而易竭,雨泽少屯,井泉辄涸,酌饮江水,人以为病。引它山之水自南门入城,潴为西湖,合境取给,始无旱晒之忧,它山

堰之为利溥矣。”[2]但这里所说的王元玮,是“开元间邑宰”。然而在同书“卷二·鄞县·祠庙十二”中,却有“它山堰善政侯庙,在县西南四十里。以庙碑考之,盖唐太和中邑宰琅琊王侯元玮之祠也。”的记载。这里虽然离县的距离与“渠堰二”有异,但值得注意的是“以庙碑考之”句,提供了资料的确切来源。这一庙碑起码早于1169年是无疑的,很可能是唐末建庙时所立。这条资料可以与《备览》中的僧元亮《它山歌诗》互证。而且该条目继续说“……故乡民德之,立祠以祀。后封为善政侯。皇朝乾道四年……”撰写人在这里有一个很明确的意思,即这座庙是立在“皇朝”即宋之前。如果说这一意识是当时确切依据的,那么使庙碑的记载起码提前了209年,而与唐大和年代最多相距150余年,就使这一说法具有更大的可信度。相形之下,同书的“开元间”说法反而失却了依据。关于这一点,历代的史料均未见有认真的考证。

在〔乾道〕《四明图经》修成的58年后,也即在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在知府胡榘的主持下,罗浚修成了一本更为详尽的《四明志》,全书凡21卷。《四库全书总目》说它“叙述谨严,不失古法”。在该书的“卷十二·叙鄞县·叙水”中,就有了进一步说法:“它山堰,县西南五十里。先是四明山水注于江,与海潮接,咸不可食,不可溉田。唐大和中,贸令王公元玮始垒石为堰于两山间。阔四十二丈,级三十有六,冶铁灌之。渠与江截为二。”[3]这里不但肯定了堰建成于唐大和间,而且提出了两个新的信息:一是堰的长度和高度,而且这一高度还要在700多年以后引出一桩公案;二是在修筑技术上提出了“以铁灌之”的新说法。此外,增补了宋代为解决“堤防浚导,岁以为常”的经费所出,“提刑程覃摄守,买田收租,以给经费”。实际上是以田租的形式,建立了一笔修缮浚治基金。

几乎与《四明志》同时代的10余年后,魏峴也写成了《四明它山水利备览》。这部著作是我国第一部关于水利工程的专著,它全

面而详尽地记载了它山堰的有关资料，为我们深入研究它山堰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史料。为此，将另立一节加以专题论述。在这部著作中，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到的是三点：首先，它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它山堰建造的确切年代，“唐太和七年，邑令王侯元玮相地之宜，以此为水道，所历喉襟之处，规而作堰。”[4]关于这一点，魏岷自己没有写明资料所出或考证的依据，但据他在对书中其他不明处的分析论证的认真态度，我们只能相信他必定会有所依据或供推论的素材的，只是我们现在再也看不到这些资料了。其次是它第一次提出了工程对于流量有效控制的概念，即所谓“涝则七分水入江，三分入溪；旱则七分入溪，三分入江。”再次，该书提出了上游水土保持的重要性。

在《备览》之前目前可以查考的关于它山堰的主要文献大体如上。此后，直到修成于1940年的民国《鄞县通志》，历代文献都沿承了上述文献和《备览》的说法，只是增加历代新修新增工程的记载，此外还有一些治水理论的思考和管理措施。主要有如下以宁波地方志为主的文献。

〔开庆〕《四明续志》，宋知府吴潜主修于理宗开庆元年（1259）。主要记载了宝祐四年（1256）起沿海制置使吴潜知庆元（宁波）府三年间，经营它山堰的配套工程洪水湾的情况。文中说到“它山洪水湾岸圯水汇，关系匪轻。委官下都保，议于是。即其地为坝三，一濒江以御狂澜；一濒河以防罅漏；一则介其间，为表里之拓。金谓江之东南有何氏竹木园，当水之冲，激其势而北，欲撤其蔽而疏通之。官为给钱，市其业，浚地为江，因畚沙以实二坝之北。河堤坚密，江水安流矣。”[5]这里不但提出了洪水湾作为它山堰的第二次分洪泄口的有机性和重要性，而且在水利工程的设计上作出了组合坝的创意，这在浙东水利史上实属首例。

令人遗憾的是，修纂于元仁宗延祐七年（1320）〔延祐〕《四明

志》却不能为我们提供新的材料。这部志书是庆元(宁波)府大学者袁楠的作品,《四库全书总目》称其“志中考核精审,不支不滥,颇有良史之风。”全书十二卷分为十二考,可惜应当有它山堰重要考证内容的《河渠考》等9-11卷竟全文脱佚,使我们至今不能一睹其要义。

成书于元惠宗至正二年(1342)王元恭的[至正]《四明续志》虽为续志,然其载始末甚详,“志中所书堤堰,补袁志所不备。”在它对它山堰的记述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有几点。一是对它山水利作用的评价中,首次提到了“以漕以灌”,[6]把交通功能提到了灌溉功能之前;二是在它山堰条目中字数不多的正文后,在附注里全文扎抄了魏岷在《备览》中阐述的关于上游水土保持对减少河道淤沙的重要性的论述,表明了编者对于这一问题的高度共识和关注;三是一改前志只重它山堰主体的作用,而不重整个工程的系统作用的局限,把它山堰、回沙闸、洪水湾、小溪港、北山古港、乌金矸、积渎矸、行春矸和仲夏堰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记述,透露出编撰者对工程系统作用的重视和进一步的认识。

此后的文献如明黄润玉[天顺]《宁波府志》、清闻性道[康熙]《鄞县志》、曹秉仁[雍正]《宁波府志》、钱大昕[乾隆]《鄞县志》等文献,在其对于它山堰水利意义的认识和史料的独具慧眼的发现上,并无大的建树。关于这些资料,清人周道遵在谈到鄞县水利时有一段综合性的评述:“成化、嘉靖二志,似于《水利备览》未及一阅者;闻志体例割裂,湖潭溪渡堤堰矸闸各以类从;……邱志但作一总论,统东西乡言之;……李志、曹志直袭邱志原文,一字不加增损;钱志仅附载于山川卷内,专据胥吏案牍,记现存矸闸丈尺之数,即旧志亦不甚加采取。”[7]

为此,周道遵在清道光间撰成宁波地方第一本水利专志《甬上水利志》。对于这本水利志评价,《四明丛书》编印者张寿镛作了简

明的阐述：“自延祐志阙三卷，河渠适在其中，吾乡水利遂往往失考。且纂志者喜谈山川景物之美，而郡国利病所在，必沿流溯源乃可下笔，则惮而忽之。以是吾乡邑志水利一门，率略而不详，为世所诟。先生独能采集诸书，尽录碑刻，桥梁详其地址，研闸详其丈尺，复分别城乡，辨其水道这通塞，而为后人修复这地……。凡前志所阙者，据以补证，且可以无憾。……光绪鄞志，为徐柳泉先生所修，水利一门独详，凡斯志所载，尽已采录。”[8]应该说，这本书在宁波的水利史料中是有独到的地位的。但其于它山堰的记载上，却主要摘抄乾道图经、李志、钱志、闻志，以及宋杨蒙《重修它山堰引水记》、宋魏行己《修增它山堰记》，以及几乎全文抄《备览·卷上》。这里我们看到撰写者对《备览》和宋人记载的重视和坚信不疑。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编者的编纂实际中，发现隐蔽其中的对于它山堰的水利思想。他以《卷四·南乡河渠》整卷为一个单位，全面记述了它山水系。其在水工建筑上，除它山堰外只记研不记堰，而所记 10 个配套研闸中，又广引史料、重笔详记了最为重要的余丰、行春、风棚、乌金 4 研。在编排中又是先写配套再记主堰。因而使我们基本可以看到编者的水利思想上的某些倾向，即蓄泄重于引水，配套重于主堰，调度重于既定容量。其所反映的是针对它山堰水利系统当时的实际，更需要强调整体调度、重点防范，和史志撰写中的反对只重考据不顾实用的务实态度。作者实际上有强烈的指导实践的意图。

其后有一个小小的插曲是清人姚燮（梅伯）的手抄本《四明它山图经》。这看上去是继《备览》后又一本关于它山堰的水利专著，但是实际上它是一本山水名胜地理之书。但是它对于它山水利的一大贡献是，姚氏通过实地的考察，理清了它山堰水系的全貌，以订证前辈学者著作中的相互矛盾。关于这一点，他在《图经·今水源委上》中说：“读魏吉州书，证之宋元七家之志，复参之以隐学、东

石、南雷、蕊泉、谢山、樗庵诸先生之言，辄不禁掩卷而疑，掷卷而起也。”[9]其后，他就深入四明山深处，从源头开始调查水系。他所怀疑和感到矛盾的，正是宁波历代地方史和水利史的大家高宇泰、谢仰曾、闻性道、黄宗羲、全祖望、蒋学镛诸先生的著作。这些由大家们各执一说所造成的矛盾，也同样困惑着一代代的研究者们。他勇敢地提出了怀疑，并采取了一种很洒脱的实证主义治学方式。

值得称道的是其后的清董沛、张恕、徐时栋在同治七年(1868)所纂的[同治]《鄞县志》。由于其书历十三年而成，付梓已是光绪年间，故又称“光绪志”。此书凡七十五卷，三百余万字，故其以“浩博详备，简繁得当”而成为一代名志。其书“卷七·水利下”的“它山堰”条目中，不但详尽地综合了此前的各种历史文献的精华，而且表现了“句句有出处”式的严谨的考据学风，成为在历代诸文献中学术性最强的一种。此书对于它山堰研究的贡献主要在于，一是把此前的各种文献进行排编考订，前后对照，去芜存精，去伪存真。因而不是面面俱到的罗列史料，而是以精确的史料尽可能简约地说明问题；二是对考据所涉有关资料取舍辨识的关键观点均以“案语”加以说明；三是搜寻大量有价值的金石碑版、序跋文章来佐证文献，附录备考，在它山堰条目中附文有：宋杨蒙《重修它山堰引水记》、魏行己《重修增它山堰记》、唐僧元亮《它山歌》，在回沙闸条目中附文有宋林元晋《回沙闸记》、清同治正谊堂《它山掏沙田碑记》等。但是，编纂者在大量有价值的考证博引的同时，却把注意力和兴趣仅仅停留在考据学问上，而对于如《备览》和[至正]《四明续志》等前代文献中很有现实指导意义的水利思想、整体治水观这些闪光的思想成果却木然置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考据学派的历史局限性。

二、修筑它山堰的动因探讨

在论述它山堰的水利意义之前,我们有必要把它山堰水系的流域情况,即宁波平原西部的地理情况作一简要的说明,从而来探讨筑堰的基本动因。

从自然地理的角度看,宁波平原分别由北东走向的四明山脉、东南走向的天台山脉和海岸线划定了它的西面、南面和东南面、以及东北面和北面的界域。它既是由山麓向海滨倾斜的滨海平原,又是东西高中部低的向斜平原。东南——东北流向的奉化江在平原的中部也即平原的最低处通过,与西——东流向的姚江在三江口汇合成甬江流向海洋。西部山区和奉、姚两江之间的鄞西平原构成了它山水系的封闭的流域。由于大江直通海洋,江水受潮汐作用,潮位线可到达西部山麓。据陈桥驿、陆祖谋先生的研究,在全新世的最后一次海侵时,上涨的海水淹没了整个宁波平原,在距今 5000 年开始的海退中,平原重新由浅海至滩涂再成陆地。在南朝的齐梁间基本完成成陆的历史。[10]这一历史表明了宁波平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土地盐碱,卤潮出没。在海退的过程中,平原的低洼地区形成了湖泊,包括鄞西平原的广德湖和小江湖。它山水系由发源于四明山深处唐田的大皎溪和发源于斤岭的小皎溪在皎口汇合成樟溪,樟溪穿越四明山的最后一段山涧溪谷地到鄞江镇冲出山口,直接流入奉化江的支流鄞江。在它山堰未建成前,鄞西平原仅靠两个湖泊蓄纳淡水,滋养着濒湖的少量土地。此外还有些通江的河流。这种情况,正如宋人魏行己《重修增它山堰记》中所说的,“夫四明泽国,负三江,捍两湖,潮汐上下,冲接山下,其来则沟浍皆盈,其去则田畴并涸。”[11]但是,鄞西原始河网是一个不能小看的蓄水载体,如果把通江的河流以堰坝阻流后,大约可获得 1500—2000 万立方米的蓄纳量。故清人周镐《永镇塘记》中有一段十分概括的话,代表了宁波平原历史形成的水利共识:“鄞,泽国也。潮江贯其中,分东西两戒。潮水咸,不利,灌溉必取资于山

泉。地势中高外卑，一泻立罄。故鄞之言水利者，堤防之力居多。……蓄淡御咸，惟塘是赖。”[12]因此，筑堤防以阻咸，引山泉以蓄淡便成为这一流域水利的主要任务，也成为它山堰及其配套工程的主要水利任务。

从历史地理的角度看，这一封闭的它山堰水系流域正是宁波平原历史形成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核心地区。东晋隆安四年(400)在今鄞江镇建立了句章县治，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句章合并了同处宁波平原的临近两个县而成为宁波平原的政治中心。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这里成了新建成的明州的州城，当时称为光溪。处于四明山口的卑狭的光溪镇，这所以受到如此的重视，原因不外乎有二，一是这里有樟溪的淡水得以灌养，二是数百年来经营这里已成为宁波平原的主要产粮地，成为历代政权的经济基地。但是，明州置州的直接动因是朝廷采纳了采访使齐瀚的意见，在建州的同时，安置了润州 500 户流民。人口的骤增，经济发展，偏于山麓一隅卑狭的光溪实际上已不适合长期地作为行政中心，从唐代初年已经把发展的目光关注到更为开阔和交通便捷的三江口地区，也即今天的宁波城市的所在地。有一个小小的历史插曲值得我们注意：唐高祖武德四年至八年(621—625)，唐政权曾在三江口地区建立过一个短暂的“鄞州”，以后又退回光溪。直到 150 年后，也即唐代宗大历六年(771)，明州的附郭县贸县才正式移治三江口。个中的原因只能解释为当时的三江口地区尚未很好的开发，也不易得到光溪这个经济后方物质抑或人力的直接有力的支持。但是未尽开发的原因，可能依旧是水资源的不足。三江口需要更多的淡水来淡化盐碱的土地，并提供聚集人口所需的生活用水。在这一封闭的流域里，主要的淡水源依旧是它山的来水。因为它山水系的上游控制着 351 平方公里的集雨面积，年平均径流深为 900—1100 毫米，也即有 3.15—3.86 亿立方米的径流量。这比

这一封闭区域的另一水源即大雷山来水（年径流量只有 400 万立方米左右）大得多。一个正在形成和兴起的未来州级城市渴望获得这些它山淡水，包括支持城市生存和满足郊区农业的用水。而且，这座未来的明州（宁波）城从一开始就落脚在它山水系这一封闭的流域中，由于大江的阻隔，东部的天台山脉的诸水就不可能为这一未来城市所利用的。实际上，到唐穆宗长庆元年（821）明州治也就正式迁至三江口，鄞县再度附郭。可以想象水的供求矛盾进一步成为了城市发展的十分现实的问题。当然，当时的人们或许还没有明确预见到日后城市人口的急剧膨胀，但是，“水难蓄而善泄，小旱则池井皆竭”，“酒民渴甚，至穴窟下滤秽滓以饮”[13]的景况，决不是一座新兴城市所能容忍的。12 年后，作为鄞县令的王元暉不能不着手实施它山堰引水工程。

三、唐它山堰引水工程的基本格局

根据魏峴《备览》留给我们的资料，唐大和七年，王元暉“历览山川，相地高下，见大溪之南，沿流皆山，其北则皆平地，至是始有小山虎踞岸旁。以其无山相接，故谓它山。……南岸之山势，亦俯瞰如饮江之虹。……其南有小屿二，屹然中流，有捍防之势，人目为强堰。其北小山之西，支港入溪，则七乡水道襟喉之地。遂因堰焉。”[14]

这里有值得注意的有几点。一是樟溪今古水道的变迁。“大溪之南，沿流皆山”，这就是说，大溪（樟溪，今当地也俗称大溪）沿着南山的山脚流来，与大江直接相连；抑或，在未建堰时本来就没有江河分流之说，它就是一条沿着南山直接流向海洋的河流。对于今天实地考察的人们，如果不注意到这一点，就很难理解它山堰的原始设计，因为今天的樟溪已改道沿北山直入南塘河，我们就无法看到它山堰作为渠道引水工程的主要特点。以至清人全祖望《东四明地脉记》中以今地貌误作“水北皆山，而水南无之。至它山忽